

当代文学理论与 圣经批评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OF THE BIBLE

梁 工◎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014057007

I106.99
12

当代文学理论与 圣经批评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OF THE BIBLE

梁 工◎著



北航

C1741986



人民教育出版社

I106.99

12

责任编辑:郇中建 刘璐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学理论与圣经批评/梁工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

ISBN 978-7-01-011985-4

I. ①当… II. ①梁… III. ①《圣经》-文学评论 IV. ①I10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1277 号

当代文学理论与圣经批评

DANGDAI WENXUE LILUN YU SHENGJING PIPING

梁 工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54.5

字数:847 千字

ISBN 978-7-01-011985-4 定价:13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

本书献给

我的父亲梁冰潜,我的母亲许漱秋

序 一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梁工教授的新作《当代文学理论与圣经批评》在长时间的系统研究、深层次的探奥钩沉、大范围的广征博引之后得以推出,为中国学界这一研究领域展示出新的学术成果,使我们的圣经文学探究又往前迈出了非常坚实的一步。在先睹为快的好奇心驱使下而急忙翻启这部著作之际,自己对梁工教授孜孜不倦、勤学好思之求学精神深感敬佩。

圣经研究是国际学术界延续千年之久、迄今仍很活跃的领域,已涌现出大量学术成果,并形成了圣经批评学、圣经阐释学、圣经神学、圣经考古学等专门学科。在当代学术发展中,圣经研究亦有不少新突破,如从古代西方教会的释经传统,发展到当代学者托马斯·奥登(Thomas C. Oden)所从事的“古代基督教信仰圣经注释”(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工作,其编辑、研究成果已用多种语言文字出版。此外,当代西方学界颇为流行的“经文辩读”(Scriptural Reasoning),亦与圣经研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对于这一亘古至今而常新不衰的研究,中国学术界近年来也呈现出奋起直追的态势,正形成繁荣兴盛的喜人景观。

在诸多圣经研究中,圣经文学研究乃独树一帜,格外醒目。梁工教授正是专攻圣经文学,在这一领域有着长期的辛苦耕耘,而且已获得累累硕果。从圣经文学的探究来看,其特点是不仅有着历史研究所勾勒出的脉络神髓和哲学研究所体现出的深邃奇奥,而且还更为生动地展示出情感的跌宕起伏、文采的绚丽多姿。这种研究有着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交织、思想与心境的共融。而对学者如何能够恰当把握,亦提出了更高要求。梁工教授这部专著在综合性研究中就有对其周全的关照,既有整体把握上的宏观阐述,也有深入局部的

微观探幽。他从理论层面切入圣经批评,显示出其思之睿智和识之厚重,而其行文构思则又充分反映出文学蕴含的诗情画意和浪漫洒脱,给人带来沉思和隽然的双重感悟。梁工教授为撰写这部著作,首先进行广泛的阅读,涉猎中外学者的众多著述;其次则是对所掌握的材料有着细心的辨识,既博采众长、又匠心独到,通过众人的智慧来寻觅新的发见,自成一家之言;最后才是以其缜密的思维、通贯的逻辑和凝练的文笔来完成全文,推出这一新颖且耐读之作。

文以载道,学有品性。梁工教授以这部新作亮明了其鲜活的学术风格,在学、文、思、书上都有自己的构思和创见。其关涉当代文学理论的分析精辟、贴切,其论及圣经批评的见解犀利、得体。读者可随着梁工教授的思绪对圣经文学研究进行一次有益的巡礼,途经圣经理学史—社会学批评、圣经文本之文学批评、圣经阐释学及相关联的哲学解释学、圣经心理学—精神分析批评、圣经神话—原型批评、圣经批评所涉意识形态文论、比较文学视野之圣经批评而追溯西方文论发展嬗变的踪迹,领略其风景全貌。其中我们可以体悟神话学、宗教学、修辞学、符号学、叙事学、阐释学、心理学、文学、哲学等新老学科的精髓或奥义,接受其各种批评的浸润或洗礼,达到一种整体观照、全方位释读的境界。

在这部新意迭起的著作中,我们理应注意到梁工教授所表达的一些关键词句:如其方法论上谈到的“宏观整体观照与微观个案相结合、追踪历史轨迹与探讨重点观点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相结合”、“充足的文献依据”与“富于深度的理论诠释”相结合等;在其内容上通过回顾18世纪中后期“从张扬信仰的神学阐释转向基于理性主义的历史批评”和20世纪中后期“从注重实证考据的历史批评转向强调文本地位和读者功能的文学批评”这两次“总体性的研究范式转型”,而以“后现代圣经批评的范式转型”来统摄其全部论述,从而完成圣经批评从“前现代”经过“现代”而到达“后现代”的华丽转身;在其结论上对“20世纪多元文论与圣经批评的互动关系”之“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所进行的如下概括和揭示:“当代多元文论的帷幕背后潜隐着两种相去甚远的认知模式——‘希腊哲学’和‘希伯来释经传统’”,前者“认为语言只是人类认知终极存在的工具性符号,而非存在本身”,后者则强调“语言和存在同等重要,经文(或圣言)等同于上帝本身,这使其认知体系中缺乏超越于语言的形而上层面”。这些表述似微言大义,仍存在着值得人们进一步去

思考、推敲的元素,从而使我们的研究能永无穷尽。

梁工教授谈到了圣经“成为历代学者百谈不厌的阐释对象”的“内在必然性”,认为是作为“早熟的儿童”之犹太民族因“连绵不绝的悲剧命运使之对宇宙奥秘形成独特的感悟”,这导致圣经成为“博大精深的文化百科全书”,以致后人“从中见仁见智,对它的解说绵延不绝”。这已不只是解释学的体会,而更有着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文化学的复杂经验。圣经对宇宙奥秘的探索和感悟使之与宇宙一样让人读不透、读不完、读不懂。人类在经历了存在和认知的“后现代”范式转型之后仍需不断摸索,不断转型。这或许也是梁工教授的新作给我们的格外启迪吧!

是为序。

2012年11月19日于北京建国门内

序 二

陆 扬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也许我孤陋寡闻,就我所见,经年累月持之以恒,带领一个团队锲而不舍地献身圣经文学研究,丰硕成果不断涌现,在国内无有出梁工教授之右者。日前梁工教授赐阅他即将付梓的《当代文学理论与圣经批评》文稿,这部洋洋洒洒七十余万言的大著,根本就是一部有关圣经批评的百科全书。姑且不论作者努力勾勒出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全貌,仅就圣经的文学批评来看,他博古通今,不但逐一交代了圣经批评的哲学、神学、历史和文化渊源,尤着重分析专门研究圣经文本资料出处的“来源批评”,还阐述了现代圣经批评如何逐渐摆脱神学主体,转向经文写作背后的历史进程,以及这样一个问题,即:后现代批评出于其离经叛道的忤逆本能,对圣经这样至高经典的阐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诚如作者所言,传统的圣经研究倡导“不偏不倚”的学术立场,但是在当代批评家看来,这种貌似公允的态度实则行不通。追求所谓的超然客观性,要么是在叨念天真的神话呓语,要么是在流露懦弱的主体意志。要之,今天我们如何来读圣经,如何来阐释上帝的不二之言呢?

写作的快乐在焦灼中滋长,读书的快乐恬静且悠长。梁工教授这本书写得辛苦无比,不过我们启卷开读,却是感到受益匪浅。且让我从头说起。作者开篇就高屋建瓴,将西方文论两千余年的走向,分为从古代到16世纪、17世纪,以及20世纪的三个阶段,分别命名为本体论文论、认识论文论和语言学文论。这个分界或许显得武断,但是作者交代了他的逻辑。先说本体论,本体论考究的对象是萨特《存在与虚无》书名中的那个“存在”,它是古希腊的传统,毋宁说就是形而上学的同义词。有鉴于本体论关心的不是事物的是其所是,而是世界及人生的其所是,所以一切有关具体的本体论,诸如美学本体论、

数字本体论等等,莫不叫人颇为猜测,难得要领,除非说话人处心积虑地构架理论,努力做到自圆其说。对此梁工的看法是,从古代到16世纪,从巴门尼德到中世纪神学,古代的哲学家大都也是神学家,无论是柏拉图的最高理式“善”,还是亚里士多德作为第一推动力的“纯粹形式”,与基督教的绝对实体上帝基本上是如出一辙。故而“明确了这一大背景,对于启蒙时代之前的圣经研究何以将张扬信仰当成其起点和归宿,就会了然于心了”。

关于认识论和语言学文论,梁工对于前者所做的论述是,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以降,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宗旨都在于努力把握绝对知识。浪漫主义诗学高举情感,现实主义小说鼎力反映人生,这都是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主臬,力图对影响文学发展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做出合理解释。所以历史学和社会学批评逐渐成为圣经研究主流,古犹太民族史及早期基督教发展演变的历史轮廓,以及圣经卷籍的作者、成书时空、受众、编纂过程等问题日渐大白于天下。针对后者语言学文论,作者以分析哲学与存在主义哲学为20世纪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潮流的代表,认为二者对语言的关注不谋而合,无论是致力于语言的“命题肃清”,还是以语言为“存在的家”,都是变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语言与存在的关系,由此语言成为哲学和美学研究的中心。这在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学、符号学、解构主义,等等,概莫能外。

由此来看圣经批评,梁工告诉我们,在前启蒙时代,圣经是无上权威,历代教父毕其终身发掘微言大义,无论是预言、纪事,抑或使徒行迹,但凡见诸圣经文本,便具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质。中世纪普遍流行,后来被但丁接下手来阐释的《天堂篇》经过字面、寓意、道德、奥秘四义说,便是典型例子。问题在于,17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及英国内战过后,许多圣经学者厌恶了吹毛求疵的释经之争,认为由此导致的血腥宗教冲突,更无必要,故圣经批评必须摆脱咬文嚼字的烦琐争端。是以斯宾诺莎、洛克等哲学家提出,应当像对待一切古代著作一样,对圣经进行不带情感因素的阅读,只关注其初始的语言内涵和历史语境,由此来解读字面义背后的精神义。惟其如此,圣经阐释才可望达成促进宽容与和平的正面功能。

及至近代科学昌明,圣经的绝对真理在一些批评家看来,莫若说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反之其道德伦理内涵,却愈益凸显出来。这一趋势直接导致现代圣

经研究的两大取向:第一是不再发掘微言大义,而转向文本背后的资料来源,造成“来源批评”的繁荣;第二是不再纠缠环绕着经文的神学话题,而转向据信支配着经文写作的历史发展进程。正是本着这一认知,梁工教授花了大量篇幅介绍关于《摩西五经》的“来源批评”。

至于《摩西五经》的“四底本说”如何涉及文学批评,梁工感受为深的是以美国资深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及《J书》为代表的一批文献。布鲁姆1973年推出的《影响的焦虑》影响了中国一代学人,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又反戈一击,斥责解构主义是邪门歪道,虽然他和德里达均为犹太后裔。J书的作者是谁?正统犹太人笃信五经是历史上的摩西写成,根本不存在所谓的“J书”及其作者,而布鲁姆却回应道,J书作者固然有可能是虚构的,而摩西就不虚构吗?那么,这位J书的作者是不是像荷马那样,真实身份是三千多年前活动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某个人或者集体?甚至,他会不会是个女性?抑或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拔示巴?假如设想J书的作者乃是以色列鼎盛时期大卫王的一位外族王后,则《摩西五经》对希伯来族长每每充满反讽,对某些族长的妻子以及诸如夏甲、他玛一类异族女性显出特别偏爱的叙事风格,思索起来,便也是情有可原了。

梁工引经据典,指出J书注重表现家庭生活,热衷于塑造积极主动且常居优势的女性形象,这是布鲁姆推测它出自女作家之手的文本依据。这意味着在J书的作者看来,夫妻、长幼、兄弟、姊妹、主仆之间的家庭关系,构成最基本的人际关系,而其他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其进一步的延伸。故进入家庭领域后,读者常能感受到女性的精明能干及其所处的强势位置。这一切是不是可以说,布鲁姆的猜想并非空穴来风,J书的作者可能真是一位观察婚姻和家庭生活格外细致的聪明女性?也许终有时日能证明,这一切并非异想天开。

本书另一处给我深刻印象的,是亚伯拉罕献祭亲子以撒与俄狄浦斯弑父娶母故事的比较。这是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中的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核心故事。梁工大量引证英国学者埃里克·威里施的《以撒与俄狄浦斯:以撒献祭的圣经心理研究》一书,清楚表明了他自己的立场,那就是希腊文化表现冲突,希伯来文化致力于和谐。两相比较,古希腊神话中的大悲剧转换成了希伯来族长故事中的大团圆。古希腊的宇宙观是二元论,希伯来宇宙观却是一元论的。亚伯拉罕父子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否则父亲当初就可以把儿

子阉割,而不是给他施割礼,见证同出一源的信仰。假如比较希腊神话多次描写的父子阉割,二者的对照是鲜明的。宙斯神话系统的发生背景是“一”与“多”的对立,然而这种对立在希伯来文化中并不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唯一真神,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类历史中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这和古希腊文化的多神论明显不同。梁工认为,这也解释了俄狄浦斯和亚伯拉罕献祭故事一悲一喜判然不同的结局。

可是说实话,我对梁工的上述结论,还是存有一点疑虑。圣经的叙事风格虽然平淡如水,不似希腊文学那般神采飞扬,其平淡如水的背后仍有惊心动魄的剧烈冲突,这一点似乎不亚于希腊文学。《创世记》里亚伯拉罕和以撒逃过一劫,应当没有必然性。同样是先知,《士师记》里的先知耶弗他以独生女儿献祭,就没有遇到亚伯拉罕那样的好运气。耶弗他要出兵打仗,向上帝耶和華许愿只要保佑他打胜仗,能够平安回家,“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11:31)耶弗他果然打了胜仗,凯旋而归,可是谁能想到,第一个走出家门口来迎接他的,居然是自己的独生女儿!耶弗他痛不欲生,可是却无济于事,他女儿到底还是作了牺牲。是不是耶弗他的许愿信口开河,太过轻率?耶弗他家里想必人丁兴旺,献上一个烧烤了给上帝享用,并不十分在意。可是他哪曾想到,这充作燔祭的命运偏偏会落到自己最心爱的独生女儿身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可见许愿许诺,千万要事先考量周全才好。

梁工师从已故的朱维之先生,近三十年来孜孜矻矻,韦编三绝,投身于圣经文学的研究,可谓是皓首穷经。在他近年出版的大量相关著述中,我以为《当代文学理论与圣经批评》是一部集大成之作。该书在结构体例上,从阐释学、形式批评、社会学、女权主义,以及原型批评等不同侧面来言说圣经阐释的学问。比如女权主义者,她们读到《马可福音》里有个女人打破玉瓶,把非常珍贵的香膏倒在耶稣头上,当时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14:9)可是这位女先知是谁呢?没人知道。我们知道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甚至很熟悉出卖了耶稣的犹大,然而耶稣这位忠心耿耿的女性门徒,却是无可奈何地被人忘却了。所以,女权主义者致力于在圣经里发掘那些被湮没的、消隐的、遗忘的女性形象,意义同样是不容低估的。

梁工对圣经研究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认为圣经弘扬的是健全的精神、明智的理性和崇高的信仰,故圣经中的上帝和耶稣可视为道德和正义的化身。从文化层面解读圣经,实即引导人摆脱野蛮鄙俗而步入文明之境。要之,一代代圣经学人孜孜不倦地为之献身,不亦乐乎。

2012年7月12日于上海

序 三

黄保罗

(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讲座教授

赫尔辛基大学《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主编及出版总监)

梁工教授的大作即将付梓,嘱我作序。我深感荣幸,遂不揣冒昧,一吐阅稿之快,权为其序。

梁教授的大名我早有耳闻,但直到 2007 年我们才在香港得以相见相识。他师承南开朱维之先生,其希伯来文学及圣经研究方面的卓著成果,在汉语学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我在国外多有关注。后来当梁教授在中文大学访问时,我恰在道风山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任职。梁教授渊博的学识,温雅的谈吐,谦卑的态度,君子的风范,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其后我们多次在青海、北京和香港等地见面,或作为讲学嘉宾,共同阐述圣经研究方面的心得;或作为会议报告者,积极讨论圣经研究与当代中国学术的互动。2010 年,我有幸应梁教授及河南大学文学院之邀,赴古都开封就“大国学的问题意识”为师生演讲,并蒙梁教授等同仁爱心接待,亲身体会了中原文化历史的深厚悠久,受益良多,难以忘怀。

这次读完梁教授馈赠的《当代文学理论与圣经批评》洋洋洒洒数百页手稿后,最令我难以忘却的,是本书的两个宗旨。其一是澄清 20 世纪多元文论与圣经批评的互动关系,涉及“对 20 世纪文学理论之多元论特征的认识,对圣经及其批评史的理解,尤其对 20 世纪中期以来多样性圣经批评的观察和思考”。其二是希望能为 20 世纪多元文论与圣经批评的关系研究提供一个范例,“表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原本是相得益彰,交相辉映的;进而,这项研究还有助于人们积极运用多元文论,从不同角度剖析、理解和鉴赏古往今来的各类文学作品”。

为了阐明 20 世纪多元文论与圣经批评的互动关系,梁教授首先追溯了西方文论和圣经批评的发展线索。

一方面,作者着力论述了西方文论发展嬗变的主线。他将从古代到 16 世纪的文论界定为“本体论文论”,经历了第一次转型后到达从 17 到 19 世纪的“认识论文论”,再经过第二次转型而到达 20 世纪的“语言学文论”;继而将当代文论的文化特征综述为注重文本形式、探索深层心理、关注读者接受、突显文化批判和倡导跨越比较。在我看来,这种追溯兼顾了“道”与“术”的纬度,从哲学层面抓住了“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学”作为西方文论得以确立的理论根基,揭示出文学批评思潮及其主张者的“前见/前理解”(Presupposition)。在这个基础上,读者能比较容易地理解各个时代之文论的表现形式和手段之“术”。这里体现出作者对西方哲学、神学和思想发展史的驾轻就熟,不仅关注了西方文论的表面思潮与方法,而且从本质上抓住了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主线。

另一方面,作者将圣经的文化品质界定为作为神学—伦理学典籍、作为史学典籍和作为文学典籍的三种特性,然后追溯了圣经批评在前启蒙时代和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全书的内容集中于介绍和分析当代圣经批评的多种方法,诸如圣经历史学—社会学批评中的来源批评、形式批评、编修批评、社会学批评、探寻历史上耶稣的努力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圣经文本之文学批评中的修辞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叙事学批评;从圣经阐释学到哲学阐释学、及其他读者中心批评方面的圣经读者反应批评、圣经解构主义批评;圣经心理学—精神分析批评、圣经神话—原型批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等意识形态文论与圣经批评等。最后作者还论述了圣经批评与比较文学,将中国文学也纳入分析阐述的范围。

像理解西方文论的发展线索一样,在辨析圣经批评的发展线索时,作者同样兼顾了“道”与“术”的纬度。正因为将圣经的文化品质作了三种类型的界定,他才能像理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发展史那样,挖掘出圣经批评方法及其批评者思想背后的前见(前理解)。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作者介绍和分析西方宗教界、学术界和社会界用于圣经批评的各种方法时,才能条理清晰、简明扼要。

作者不仅关注圣经和文学作品及其批评,而且把它们放入西方文化思想

史的总体视野之内,整全性地兼顾了多个方面,暗合了笔者提倡的“汉语学术神学”应该通过“完整性”来界定“学术性”的主张。^①

作者在全书的介绍分析中涉及非常宽广的领域,但这并不会使读者眼花缭乱,因为全书以理解西方文论与圣经批评二者之间的互动为宗旨,目的明确,线索清晰。一方面,作者探讨了当代文论对圣经批评的拓展和深化。在分析多元化圣经批评局面形成的原因后,作者指出,由于受到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圣经批评经历了从历史过程转向文本自身、从表层心理转向深层心理、从作者意图转向读者接受、从封闭思辨转向文化批判、从单一阅读转向综合解析的发展变化趋势。这一判断从西方文论对圣经批评的影响视角清晰而系统地论证了二者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作者也从圣经研究对文论建构的哺育和贡献角度论证了二者之间的互动,所涉论据包括圣经研究孕育出某些文论、圣经研究为文论成长提供营养、释经规范转型为诗学原则、圣经研究施惠于文艺批评方法,以及圣经研究为检验新兴文论提供试金石。

笔者在很大程度上认可梁教授的观点与论证,并曾通过改造桐城派的文论,提出圣经的义理、考释和辞章研究之分。一则将圣经的特征界定为神学(作为神启的上帝话语)、人文学(反映历史文化的人类史实)和文学(体现艺术虚构的文学作品)三种品质,它们是圣经义理研究应当着眼的三个方面。二则将圣经文本研究分为本文考据和意义诠释,它们能综合圣经批评史中兴起的各种方法。三则将文学辞章扩伸为艺术创作,用以研究圣经的文学性。^②像梁教授一样,笔者不仅意在澄清西方文论与圣经批评的互动关系,也是为了准确、全面、完整地理解圣经。这不但要求研究者兼顾文本、作者和读者,而且需要考虑文化、社会和政治等语境,因为“前见(前理解)”会深刻地影响学人对圣经的诠释。我认为,这也是梁教授在本部著作中表明的重要观念。

概而言之,笔者以为,梁教授兼顾“道”与“术”的纬度,不仅分析了文论与圣经批评的各种具体方法,而且挖掘出其背后的前见(前理解);在介绍和分析时抽丝剥缕,举重若轻,繁而不乱,并把问题探讨放入整个西方文化思想史

^① 参见黄保罗:《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导论:第三节,“一、再论什么是汉语学术神学?”

^② 梁教授对圣经文化品质的界定与笔者相似,参见黄保罗:《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圣经义理研究”部分。

的视野内,从哲学、神学、文化思想和技术方法发展史的视角兼顾了树木与森林的关系,由点及面、层层深入、环环相扣,使整本书显得深刻厚重,立体感极强,体现出整全性的思考。全书不仅兼顾理性、情感、意志和信仰,而且通过科学(特别强调实证主义)、哲学(特别强调理性主义)和神学(特别强调神秘主义)的研究方法予以综合性探索,清晰地阐述了 20 世纪西方文论与圣经批评之间的互动关系,雄辩地表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原本是相得益彰,交相辉映的。

谨以此抛砖引玉,启思导读,请作者与读者批评指正。

2012 年 6 月 4 日于芬兰赫尔辛基